

学习 访谈

“绽放”永恒的诗篇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朝戈金

本报记者 张丽

编者按:

不久前,《格萨(斯)尔》《玛纳斯》《江格尔》三大史诗以节目《永恒的诗篇》的艺术形式绽放在2024年央视春晚舞台上,散发出独特的魅力。三大史诗保护传承传播面临着哪些新挑战新机遇,在文化交流文明互鉴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如何进一步加强以三大史诗为代表的口头传统的理论阐释,加强理论成果的宣传推广与转化?本报记者就此相关话题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哲学部主任朝戈金。



朝戈金

写系统只有几百种,其中还包括不少废弃的古文字。在人类发明和使用文字的这几千年里,占压倒性多数的人口是文盲,这在东方西方都一样。掌握文字的是少数人。

回到文学领域来,口头文学的历史非常悠久,传承非常广泛,差不多涉及每个人。书写的文学是从口头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主要局限在“阅读人口”当中,影响范围主要在书写文化里。总之,综观整个人类的文学发展历程,如果说口头文学是普遍的,那么书写的文学则是局部的。中国的情形也差不多是这样:在上个世纪中叶,中国的成人文盲率占总人口的九成上下。所以说在中国文学发展历程中,口头的文学是“大端”,书写的文学是“小头”,只不过书写的文学作品大多被记录并流传下来,寸累铢积,蔚为大观,而口头文学的艺术吟诵是“大风中的歌”,多随风消散,百不存一,给今天读者的印象,就是历代诗人作家名流辈出,反观口头歌手则是“月明星稀”,不大得见。不过,从五四运动开始,众多进步学者转而开始重视人民大众的文学。仅就20世纪而言,在北京大学歌谣运动的感召下,上世纪20年代曹聚仁写过《平民文学史》,30年代郑振铎写过《中国俗文学史》,都是将注意力从精英文学转到草根文学。如果我们目光投向远久的过去,就会知道古代通过“采诗之官”从民间搜集口头文学以“观风俗,知得失”的道理。那么今天的我们就更需要放低姿态,好好做民众的小学生,了解

设和相应歌手传承的安排,出现了传统格萨尔故事的当代影视改编等。也就是说,对我们来讲,一方面要考虑通过制度安排和工作设计,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另一方面,要充分尊重民众的智慧和自主权利,让他们放手参与到优秀传统文化保护的各个环节中,因为他们才是文化的主人翁。

在文明互鉴中加强对史诗的中国式阐释

学术家园: 中国三大史诗与其他文明的史诗相比,有哪些特色?近年来,您的身影经常出现在国际学术交流的舞台,在您看来,三大史诗的研究在文化交流文明互鉴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朝戈金: 将中国史诗传统放在全球史诗的巨型画廊中观察,就会发现中国史诗具有诸多突出的特点。

简要说来,第一,中国史诗是活态传承的口头史诗。世界文学史上那些最为人所知的史诗,如两河流域的《吉尔伽美什》,古希腊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还有日耳曼、法兰西、英吉利等的史诗,今天都只能见到文字文本,也就是口头诗学所谓“书写的遗骸”,已无从知晓当时的口头讲述情况。中国境内存续至今的大量史诗,至今都保持活的口头讲述形态。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标本与活体,哪个包含更多的信息,这是不言而喻的。第二,中国

些山歌属于一个由众多人长期传唱的传统。此外,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之间还有诸多差别,如前者通常是在同一空间中(场域)完成创作、传播和接受的,也就是说,刘三姐们现场演唱,受众们现场聆听,唱完听完,文学创作和接受活动在同一时空完成。而书面文学在几个环节上通常是分离的——读者对李白诗歌的阅读活动,在时间维度上可以发生于有唐一代及其千年之后,在空间维度上,可以发生在唐朝疆域的万里之外。就文学生产者与文学接受者的关系而言,刘三姐们在与受众的直接互动中完成文学生产和传播活动,而李白们和读者们之间则隔着一个被客体化了的抄本或刻印本。文学文本是独立存在的,而山歌的演唱过程中歌和歌手是一体化的,既有声音符号的传递,也有歌手身心的直接参与。读者用眼睛完成阅读,其结果是产生了客观性和距离感;受众同时用眼睛和耳朵接受歌谣故事,加之置身表演场域当中,而且常会做出积极反应,与演唱人互动,也就直接参与并影响了文学生产过程。

上面列举了口头文学和书写文学的诸多不同之处,这里还要补充一句:无论二者之间有多少差别却仍共享着诸多相同之处——归根结底它们都是“语言的艺术”,都要通过对语言的艺术化运用完成文学的生产与接受。所有与语言的艺术特性相关的方面,所有与文学的基本法则相关的方面——从内容到形式,都与这两种文学直接相关。在不久前的春晚舞台上,各民族史诗歌手通过向全国观众讲述口头史诗的经典片段,让我们再次领略到口头文学和口语艺术的魅力,体会到为什么说这些伟大史诗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提升传统文化“生命力”和“存续力”

学术家园: 从文学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为什么要研究口头的文学?

朝戈金: 就人类的情况而言,语言发明和使用在先,文字发明和使用在后。有学者经过研究说人类会说话的历史距今已超过10万年,而我们所见最早的文字距今不过几千年。总之,语言历史久且数量多,文字历史短且数量少,这是有根据的——不久前的全球语言数量统计结果是大约7000种,而书

他们的思想感情和艺术创造,以更好地推动社会文化建设和文明进步。

学术家园: 随着三大史诗在保护传承研究上的不断加深,近年来在此方面面临哪些新挑战新机遇?

朝戈金: 以三大史诗为代表的口头文学的传承和发展,当前面临种种挑战。

一个是经济社会的发展,让传统的文化生态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口头传统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恩格斯曾说社会进步会令神话失去存在的土壤,指的就是经济基础和社会现实与观念意识之间的彼此依存关系。

再一个是,进入高科技飞速发展的时期,人员、资讯、技术、货物、金融等的加剧流动,教育的大幅度普及,旅游、战争、灾害等的冲击,都令地域性、传统性文化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受到挤压。

还有,信息技术的进步,在口头交流和书面阅读之外有了电子传媒,就再次降低了参与信息技术的门槛。多媒体形态的电子化传播,从传统文化守护者的立场看,就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网络传播令传统文化有了极大扩张的机会和可能,晚近大数据统计的我国非遗对网络的利用,数据十分惊人,就是一个有力的说明;另一方面,传统文化在传承中的直接性、具身性和参与性,就被网络技术制造了疏离——虽然瞬间无远弗届,但失去了直接的语境。不过,不能轻视广大人民群众智慧和创造力,他们从来就有智慧和能力继承和发展优秀的传统文化,使之在新历史条件下以新的姿态获得发展。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经常出现的关于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存续力”的总结,就是有力的证明。例如藏族民众对《格萨尔王传》的改造,就是一例。在传统表演形式之外,近年出现了格萨尔的马背藏戏,出现了“艺人之家”的建

学习·践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历史学研究的一些具体领域,从中国本土出发开展研究已渐成主流,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史重返故土”的研究热潮,将会在未来若干年内,在史学研究的更深层次和更广范围内展开。用中国话语发展当代史学理论,建设有中国话语特色的史学理论体系,建构有内在逻辑联系的理论形态的中国历史学已然成为学界共识。新时代的中国史学理论研究,需要朝着构建中国历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这一方向,作出更大努力。

建设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史学方法论, 建立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也是中国史学的旗帜和灵魂,在我国的史学研究中居于重要的指导地位。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等领域内的交锋一直存在,要从根本上破除各种西方思想特别是后现代思潮对中国史学研究的不良影响,必须建设创新的、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史学方法论,加强对学科理论、学科概念的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这项工作要从学科建设做起,每个学科都要构建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成体系的学科理论是形成中国风格学术体系的理论指导,成体系的学科概念是建立中国特色学科体系的理论基石。对于历史学研究来说,就是要改变当前部分研究领域内存在的“碎片化”倾向,打破各研究领域之间的壁垒。既要完善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研究,包括历史认识论、本体论、方法论;也要注意总结、提出具体历史研究中的理论问题,注重从长时段、大历史的研究中形成理论性成果;更要注重对重大理论问题的关注和现实问题的回应,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问题,对待西方的史学理论,需要站在中国史学立场,审视其价值意义。

发扬中国史学优良传统, 发掘中国史学的民族特色

历史具有传承性,文化也有其传承。作为中华文化灿烂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中国传统史学在漫长的演进过程中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修史制度和秉笔直书、关怀现实、注重经世的优良传统,出现了司马迁、刘知几、章学诚等一大批“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杰出史学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新时代史学研究的健康发展、中国特色史学理论话语体系的构建,同样也需要从中华民族积淀深厚的史学传统中汲取营养。这些都要从新时期的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发扬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发掘中国史学的民族特色。一是要加强对中华民族史学传统的阐释和辨析。源远流长、内容丰富的史学传统是当前构建中国特色史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宝贵资源,也是新时代丰富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重要源泉。构建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话语体系,需要注意沟通马克思主义史学基本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将唯物史观同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积极吸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精华,并合理借鉴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优秀成果。二是要做好理论概括和研究阐释。这就需要学术界在对传统史学的研究和分析中,努力总结和阐释那些显示中国史学民族特色、具有当代价值,具有中西融通学理意义的内容、思想、命题和方法,并力求作出新概括、新表述,以展示传统史学智慧和现代史学的成就与独特魅力,促进中国学术向世界传播。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呼唤理论创新,史学研究工作者要从中华民族5000多年连绵不断的文化传统的优秀基因中,创造性地发掘出具有普遍意义和未来价值的文明观念,并真正将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成我们思考世界、思考历史和思考时代的有效方式,自觉承担起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的时代使命。

(作者系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 历史理论研究所党委书记、所长)

构建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话语体系

杨艳秋

系建设和创新,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长期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2019年1月2日,在致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为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构建指明了基本的路径和方向。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又提出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这一重大任务。

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一方面凸显的是中国史学的主体性地位,要求学术的继承性和理论的创新性;另一方面则凸显的是中国史学的实践性和时代性,推动学术研究与新时代发展的同频共振。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还需要进行知识、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推动中国史学屹立于世界史学之林,凸显中国史学的世界价值。史学研究工作者要在对中外优秀史学理论遗产的综合研究中,汲取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一切科学研究的优秀成果,创造性地建立研讨中国历史的新思路、新方法,在国际史学对话中作出科学回应,形成国际学术前沿的相互关联。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呼唤理论创新,史学研究工作者要从中华民族5000多年连绵不断的文化传统的优秀基因中,创造性地发掘出具有普遍意义和未来价值的文明观念,并真正将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成我们思考世界、思考历史和思考时代的有效方式,自觉承担起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的时代使命。

(作者系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 历史理论研究所党委书记、所长)

坚守中国史学立场, 构建中国历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这一重大任务,并强调“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



2010年,朝戈金在美国哈佛大学会议厅的国际学术会议上介绍中国史诗。



学习·践行